



学来牟利，无视国学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随意解说，这与国学的现代化南辕北辙。

所谓开放的态度，是指当代的国学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人类文明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就很难得到发展，甚至还会逐渐萎缩，中华文明同样如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开始得相当早，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更广泛；至明代，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途径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最远达到东非沿海；明末清初，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国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文化交流关系。中外文化交流，不但使中华文明得以弘扬，而且使中华文明得以滋养，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伟大贡献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瓷器、茶叶、丝绸以及园林建筑营造了18世纪弥漫于欧洲的中国情调，而中国的孔孟儒学、科举制度、文官体系、科学技术，对日本、韩国及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也从外来文化中吸取了养分。

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应当开放胸襟，吸收、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使国学精神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具体而言，在指导思想，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对人、人生、人性的关注和人精神境界的提高既是中华文化之所长，又是对当今世界物质文明片面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弊病的一种纠正与补充。在环境污染、毒品泛滥、暴力盛行、精神空虚等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以科学的态度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人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内在精神的提升，对人们摆脱精神焦虑以安顿自我、正确对待物欲以提升自我，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儒、佛、道三家的人生哲学并非完美无缺，它们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发展，需要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联系而吸收新鲜血液，才能更好地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弘扬国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

第五节 学国学的方法

历来对如何研究和学习国学，众说纷纭，各有心得，有从整体把握者，有分经、史、子、集而言者，有从具体方法着眼者，下面试分类叙述。

一、宏观读书法

从国学内容的整体提出研究和学习的方法者，如梁启超，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提出：“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又如章太炎，他专门从以下五个方面谈到治国学的方法：（一）辨别古书真伪。“对于古书没有明白

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别书籍的“真伪”。（二）通小学。韩昌黎说：“凡作文章，宜略识字。”（三）明地理。“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都是在一定的空间演绎的，历史地理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四）通古今人情的变迁。不同时代，制度在变，民俗民情在变，社会道德在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在变，不了解这些，对历史就不明白。（五）辨文学之应用。辨明有韵与无韵的区别与实际作用，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征。

马一孚则主张从整体精神上学习国学。1938年，马一孚先生与浙江大学师生南下避日寇侵袭途中，曾在江西泰和与广西宜山讲学，其国学讲座后来刊为《泰和会语》，里面揭橥“治国学先须辨明四点，方能有入”。他认为国学不是零碎片段的知识，不可当杂货看待，治国学，首先，要在心态和知识结构上避免成为专家狭士，要从整体上去掌握中国学术的格局、气脉、性质，寻找文史、艺术、宗教各领域贯通的气韵精神或观念。其次，国学不是古董，而是活泼泼的，如《论语》开篇之乐感、美感文化，正是足以贯穿理解《论语》乃至儒家道家精神之所在，至今仍然是活泼泼的。再次，国学乃自然流出、非勉强安排出的道理，故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例如说《周易》具有现代科学乃至超科学成分，耶稣曾来中国传道，墨子是印度的黑人婆罗门，《尚书》里的上帝是耶和华，《楚辞》显示巴比伦文化乃中国文化之源等均是附会。古书记载不尽详处，刻意穿凿以显小慧，短钉不是治国学应有的态度。最后，治国学当向内体察，不可循物忘己，向外驰求。中国学问自来强调成己成物之学，能否开物成务，须待外缘，成己却是可以自己掌握的，让自己成为明是非、具见识、有能力、有文化的人，学问是落实在身心实践上的。

二、经、史、子、集分类读书法

梁启超在其所编撰的国学举要书《学要十五则》中说“四库之书，浩如烟海”，关于经学，“必以《春秋》为本”，而言《春秋》，“尤以《公羊》为归”。关于史学，指出“《后汉书》名节最盛，风俗最美，读之令人有向上之志……最可学，亦最易学，故读史当先《后汉书》”，并引用陆桴亭、康有为的读史方法，分为六事：一曰政，即典章制度之文；二曰事，即治乱兴亡之迹；三曰人，即为贤为恶，可法戒者；四曰文，即或骈或文，可诵习者；五曰经义；六曰史裁。关于诸子，“欲悉其源流，知其家数，宜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一段、《汉书·艺文志》中‘九流’一门、《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然后以次读诸子”。关于义理之学，“入学之始，必惟义理是务”，“读《象山》、《上蔡学案》，以扬其志气；读《后汉·儒林》、《党锢传》、《东林学案》，以厉其名节；熟读《孟子》，以悚动其神明。大本既立，然后读《语类》及群学案以养之”，“凡读义理之书，总以自己心得，能切实受用为主……不必以贪多为贵也”。

张之洞也曾对读经史的宗旨表达看法，认为经学贵通大义，即“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每一经中，皆有大义数十百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串，方为有益。若乃随文训解，一无所得，仍不得为通也”。读史学应该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

通



识



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张之洞《劝学篇·守约》）。章学诚也曾说过：“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童蒙初启，当令试为经解、史论。经解须读宋人制义，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开合反正，兼参之以贴墨大义，发问置对，由浅入深，他日读书具解亦易入也。史论须读《四史》论赞，晋宋以后，姑缓待之，史家论赞本于《诗》教……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形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蒙幼初开，得其调达，正如春草初生，郁葱气象，妙于青碧有无之间，较之夏器高粗，尤为美舍不尽；而且其体本于风人，其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化无穷之业，尽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务也。又且短篇易于结构，浅近易于仿摩，俾与经解相间为之，即使欲为举业文字，亦自灿然可观，又何惮而不与习邪！”（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

三、微观具体读书法

马一孚先生认为治国学宜先立志，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孚《泰和会语》）。张之洞的读书方法，一是勿待其时：“若必待插架三万，然后议读，终身无此日矣。”随得随读，积水成渊。二是勿畏其难。学问门类虽多，终究殊途同归，“古集一家，词章一体，经济一门……观其大略，知其要领……不过十年，卓然自立……若津渡显然，定向有在，循途而行，计日而到，何难之有？”三是先博后约。天下书浩如烟海，应多见多闻，然后专攻。四是勤用笔墨。读书懒下工夫者，常以记性不好为借口，若能敏于动手，“日记一页，月记一卷，十年之内，可记百余卷矣”。

曾国藩一生勤奋好学，他曾给自己定下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十二、夜不出门。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做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此外，我们通常运用的学习方法还有诸如摘抄法，朱自清即是典型。朱自清读书重视笔记，分门别类地摘抄卡片。他用这种方法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他写的《诗言志辨》等学术著作，不仅见地精辟透彻，其论据之丰富也是令人惊叹的。

多看多读法。朱熹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

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闲逛或“随便翻翻”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当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初学者或理工科的学生，可采取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问题；或采取跳跃式，不懂或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至，久了自然可以曲尽其奥。

自得自求法。章太炎生前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处，则问之。”学问当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才问。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但是它根本的典籍就那么一些。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都读得完的。只要我们立定志向，持之以恒，掌握恰当的学习方法，掌握中国文化是可期的。

但是，掌握适当的方法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洗去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五四”时期，在北大求学的梁遇春写了一篇《还我头来及其他》，文中说他与同学谈话时，感觉同学是全知的，对一切问题都有一定的见解，“他们知道宗教是当‘非’的，孔丘是要打倒的，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文学是苏联最高明，小中大学都非专教白话文不可，文学是进化的，因为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学进化论》，行为派心理学是唯一的心理学，哲学是要立在科学上面的，新的一定是好，一切旧的总该打倒，以至恋爱问题、女子解放问题……他们头头是道，无一不知”。但他们的观点“总是大同小异——简直是全同无异。有时我精神疲倦，不注意些，就分不出是谁在那儿说话”。因此作者大声呼吁：还我头来。要求人们要潜心体察、身体力行，不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还我头来”这句话及其内在含义，对今天我们国学学习与研究仍然具有现实警醒意义。首先，今天，学习国学者和精英文化层，在不违背经典原意、也不脱离社会现实的总体命意下，从事现代化的文化寻根和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学习和研究，这是国学热的正宗与砥柱。其次，是近年来民间创办私塾、蒙童馆或国学班，比较系统地讲授国学。有的学校，甚至先生着长袍，学生穿长衫，挂孔子像，行跪拜礼，一切如旧时学堂。这种国学传授，采取传统的旧模式，从“正规”、“正经”方面来说，是好的，但缺乏现代意识、现代精神。再次，是文化快餐式的学习。这是目前国学热的主

通



识

要表现形态，也是国学热最大的“热点”。这是一种文化消费，这里进行的是快餐式、心得式的讲解、阅读与接受，他们从传统经典部分地、片面地截取自己所需的，夹带有主观随意性和任意性的“误读”，穿凿附会出他们所需要的“意义”。文化快餐式学国学有使国学普及化、群众化的一面；不过，其无意或有意的误读、曲解，甚至用国学媚俗，使国学俗世化、商业化，则于国学有害，于传统文化有损。我们只有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学国学，才能更好地普及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姜义华.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学术月刊，2007（7）
- [2] 姜义华.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下）. 学术月刊，2007（8）
- [3] 张岱年等. 国学今论.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 [4] 冯天瑜. 对时下国学讲习的期待. 长江学术，2008（4）
- [5] 林藟. “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 [6] 徐友渔. “国学热”的浅层与深层问题. 博览群书，2009（11）
- [7] 洪修平，许颖. 对当前“国学热”的再思考. 精神文明导刊，2009（3）

